

延安时期卫生运动与政治现代化转型：对《解放日报》卫生报道的考查

刘欣 郭耕延

西安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12238/jrm.v1i1.9923

[摘要] 抗战时期,边区卫生运动的群众性社会动员成为其显著特征和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从政治现代化转型角度看,群众动员在乡村社会的深入性和影响力,推动卫生成为一种新的公共利益在基层社会被广泛传导、识别和认可,形成的社会秩序准则和行为标准,塑造了农民个体政治观念、情感倾向和行为选择。农民个体接受民主政治训练,增强政治意识观念,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政治支持和情感纽带。卫生运动在社会治理功能之外,具有政治传播的功能。延安时期卫生运动背后的政治属性功能揭示了,近代中国卫生知识传播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志、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变迁,构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卫生运动; 政治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R115 文献标识码: A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Movement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Yan'an Period: An examination of the health report of Jiefang Daily

Xin Liu Gengyan Guo

School of Marxism, Xi'an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mass social mobilization of the health campaign in the border areas became one of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its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depth and influence of mass mobilization in rural society has promoted health to become a new public interest that has been widely transmitted, recognized and recognized in grassroots society, and the social order norms and behavioral standards formed have shaped farmers' individual political concepts, emotional tendencies and behavioral choices. Individual peasants received training in democratic politics, strengthened thei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ed their politic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ties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In addition to the fun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health movement has the func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political attribute function behind the health movement in the Yan'an period reveals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political will,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behind it constitut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Key words] Yan'an period; Sanitation campaign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政权、经济和文化社会建设,成为支持残酷军事斗争,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艰苦条件下边区卫生工作成效显著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党对一切事业领导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依靠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群众性参与构成边区卫生运动的显著特征。^[1]群众运动弥补了当时卫生资源有限、政治动员难以短时间奏效的困境,大范围的群众参与使卫生教育

影响力深入基层,通过传播卫生意识和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传播,有效利用极其有限的卫生资源,提升边区卫生健康水平。从政治治理角度看,群众性卫生运动对基层组织形态的重构、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改变、对基层人民政治意识的养成等,其影响力超越了卫生防疫工作本身,产生的政治整合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随后的全面执政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2]。

本文试图探究卫生运动对巩固边区政府权威及其影响为标

准,如群众政治心理改变、社会生活标准的形成和基层社会组织秩序的转变,探究“卫生”所蕴含的政治现代化因素。下文将以《解放日报》登载卫生报道为对象,分析卫生运动的推进策略和特征,揭示卫生运动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从卫生行政工作的推进和群众反馈这两个相关角度,探究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之间生动的双向互动。以卫生运动对巩固边区政府权威及其影响为标准,如群众政治心理改变、新的社会生活标准的形成和基层社会组织功能的扩张,探究“卫生”蕴含的政治现代化因素。

1 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策略

自中国共产党走上红色割据的革命新道路,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面对各种严峻的现实困难,群众运动成为主要工具。在防疫工作中,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尝试通过群众动员传播卫生知识,推动环境卫生、传染病处置和饮食卫生^[3]。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推行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苦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4]。边区卫生状况恶劣的原因,除了地处内陆,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自然灾害频仍,还有战争、封锁所带来的卫生资源短缺。而群众普遍没有看病的习惯,缺乏卫生习惯和卫生意识,生病依赖巫神,落后迷信等观念是边区疫病大规模流行的主观原因^[5]。因此,在极度匮乏卫生资源条件下,以群众性卫生运动方式传播科学卫生常识,改变群众卫生意识、形成良好生活习惯,是解决当时边区疫情肆虐、卫生状况恶劣的有效切入点。

1.1 诊疗先导开展卫生教育

抗战初期,各根据地的医疗机构主要服务战争,也为驻地老百姓提供一定医疗服务。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各级卫生单位今后要无条件地为老百姓看病及办理乡村卫生并划分区域,各单位开始有计划开展群众卫生工作。这种转变来自抗战形势的一定好转和整风运动的积极影响^[6]。至此,各卫生机构进一步向群众敞开大门,主动送医下乡。如卫生教育机构组建临时防疫医疗队扑灭急性传染病^[7]，“医大教育长曲正同志亲自率领的防疫队，……发现病人，马上赶到，连夜守着病人，直到病好才离开^[8]。”又如部队卫生部门“‘友爱’部野战医院，去年给吴旗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共看病三百五十次，……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不惜代价的给人民医救，阻止了流行病的传染^[9]。”再如安塞某机关卫生所，除每日中午免费为群众治病，还专门成立了服务群众的病员招待所，群众自带干粮，即可免费入住^[10]。行政干部也参与卫生下乡工作，区上干部下乡工作时，身上随带药品，亲自为群众治病^[11]。延安保小卫生所罗冬祥医生寒冬深夜奔波百里为群众复诊^[12]。

医药救助主动下乡,通过救治群众生命成功事实,破除群众迷信思想,为卫生防疫宣传扫除障碍,“原来过去群众得此病者,不是请阴阳,便是拜菩萨,夜虎沟的一个阴阳被请去念经,亦被传染,结果还是找到医院同志才治好了,从此打破了群众的迷信^[13]。”卫生知识教育顺势展开,传染病“其主要原因乃由于不

讲卫生和细菌传染之故。医大医疗队为证明此点,曾把有病菌的食物和生水放在显微镜下,让群众观看,因而收效很大。”卫生教育使群众转变了观念,“老乡们已初步的看出防病的重要,知道治病要找医生,巫神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趁此时机,更用一切力量来使老乡们接受科学医药卫生的道理^[14]。”子长县政府主动与抗大卫生队联系种痘事宜,事前对防疫种痘工作程序作出细致的宣传和安排,取得很好的效果。“由于宣传深入,解释清楚,群众都争先恐后的抱小孩去种牛痘^[15]。”

当群众疾病观念转变,开始接受诊疗就医方式后,卫生机构见缝插针开展候诊卫生健康教育,进一步强化卫生知识传播。当时医生和诊所数量较少,群众排队时间长,设置专门的卫生宣传人员对正在等待的患者及其陪同家属进行卫生知识教育,形成科学卫生观念。候诊教育形式通俗灵活,“进行候诊教育的方法,除了有计划的向他们讲一些卫生和疾病预防常识外,还可以根据需求和季节,画一些通俗的卫生挂图,或设置一些通俗的卫生宣传的画报等,配合进行^[16]。”

针对群众关心的日常疾病,《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定期发布简明健康常识。这些宣传结合时令,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以日常生活为视角,通俗剖析传染病病因,提出预防解决的日常生活建议。如天热时蚊虫滋生,号召“赶快预防出水病、卖扫帚病、上吐下泻病”^[17],告诫群众“为啥不敢喝凉水、吃生冷”^[18];还有“怎样预防上吐下泻病——几点马上要做的事”^[19];对当地常见病的病因分析“关于口吐黄水病的初步探讨”^[20];针对普遍存在的孕妇生产后身体虚弱问题,刊发“血迷是怎样一回事?”^[21]这些浅显易懂的卫生宣传,根据不同季节传染病周期爆发特点,以及日常群众关心的产妇产后、幼儿养育等问题,传递科学卫生道理,培养群众卫生意识,通过公共舆论的广泛传播,便于群众在日常生活操作,逐渐养成科学的卫生意识和习惯。这些简明卫生知识,通过在各村普遍设立的读报组和扫盲班等形式得以广泛传播,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报纸也经常刊载群众在卫生上的各种求助来信,可见传播效果良好。

1.2 疫情防控加强卫生观念

在边区政府颁布的卫生防疫法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传染病分类、报告、隔离制度和预警的法定工作机制^[22]。在疫情爆发的紧急情况下,《解放日报》作为重要的公共信息平台 and 公共舆论渠道,及时跟踪并发布疫情预警的相关报道,起到预警信息传达、防治措施普及、卫生教育推动的作用。

如1944年年初延安爆发了一次严重的流感疫情,自2月爆发至5月下旬消散,《解放日报》全程密切跟踪,报道内容主要涉及:描述疫情症状,向其他地区发出预警;卫生和行政部门分工配合提出针对性举措和工作部署,防治工作和防疫宣传教育并行;在疫情结束后,各级组织总结防疫经验,确立未来工作方向^[23]。《解放日报》对此次疫情处理过程的跟踪报道,充分显示出边区政府在处理紧急疫情的及时和高效。作为疫情信息传递和预警的特殊公共渠道,《解放日报》发挥了重要的上传下达的中介作

用,“各地本报通讯员在报道疾病消息时,希将病状详细写出,以便此间医药卫生机关判断提示防治办法^[24]。”在社会影响力层面,通过《解放日报》对防疫工作状态的追踪和信息发布,基层及时掌握疫情扩散状况,以便事前防范。在疫情期间,这些报道受到广泛的关注,大量的防疫经验、防疫安排和卫生知识普及等内容以更快的速度传播,这些生活化的经验和知识便于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学习巩固。随着疫情的控制和消散,这些与卫生相关的知识、组织和观念在基层影响了个体生活和社会组织,基于新知识产生的新社会秩序得以顺理成章的形成和继续运行。

在边区群众卫生意识的形成中,疫情是一种非常常态化的状况。疫情防控不仅事关个人的生命,更是一种影响范围广泛的公共性重大事件,对疫情过程和防治过程的公开信息传播和大众阅读方式,使基层群众清晰了解边区政府在防疫工作上所做出的持续性努力和尽职尽责。通过疫情被扑灭的事实和政府对未来卫生工作规划,增强了卫生运动对群众的说服力,促进普遍卫生习惯在基层的养成。同时,通过疫情的现实危害性和防治疫情的有效性的事实教育基层干部群众,必须高度重视开展卫生运动对个体生命健康与经济社会稳定的联系,达到促进群众性卫生运动和推动经济生产的长期效果。

1.3 公开表扬和批评规范群体行为

卫生报道中不乏许多具体到县乡村、个人姓名的表扬或批评的报道。由于《解放日报》在边区的巨大影响力和舆论扩散性,这种公共舆论对个人的约束效应,客观上建立了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卫生评价标准,推动了卫生知识对个体行为和意识的规制。

表扬报道对接受卫生知识、养成各种良好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细节的详尽描绘,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范例,通过公共舆论传播建立普遍遵循卫生标准和对实际工作的参考。所有受表扬的人和家庭均有名有姓,这使一般群众充分意识到,在这些真实案例中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并非不可能。如对绥德模范卫生家庭王恩甫家的表扬中特别强调“他家的经济状况相当于中农”,以中等之家养成卫生习惯为例证,批评讲卫生只有富裕人家能够做到的错误观念^[25]。群众以受到表扬为荣,在1944年延安各界卫生动员大会上,“这时正在发奖章和大红花给卫生模范工作者和模范卫生家庭。许多老乡笑嘻嘻的把红花扣在衣襟上^[26]。”

批评报道的对象有两类,一是曝光不重视卫生工作的行政部门,促进其转变轻视卫生工作的态度,这无疑对各级政府卫生行政工作产生了压力和横向竞争动力^[27]。另一个就是对不讲究卫生个人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人情“面子”为主导的乡村社会,这种具体到县乡村和姓名谁谁的公众舆论压力,迫使村庄以及个人不得不接受被大众所认可的新卫生规则。如安塞县陈崂村冯不成抱怨家里负担重,当众表示做不了村里定下的卫生公约,“当时便有人起来和他们斗争说:‘你不讲卫生,真是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你家里生病不算,传到全庄怎么办呢?你要不讲卫生,庄里生了病就要你负责。’”最终迫使其不得不在干部和村民的

帮助和督促下,依据卫生标准改变生活习惯^[28]。在边区卫生运动大潮中,个体生活习惯已经不再属于单纯的私人领域,社会生活还必须严格符合以卫生知识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这些新规则对所有个人产生强规制和导向作用,这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生活而言,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规则。

《解放日报》表扬和批评报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个人,还在更大的范围激发出基层群众之间自发竞争,产生群众性卫生竞赛运动的联动扩散效应。如延安王家坪村,“在第三次卫生委员会上批评了王家坪,卫生组长回去后再次召集了居民会,说王家坪受了批评,与杨庄科一样不讲卫生。这一下大大激动了他们……大家动手移牛圈,扫洞畔,拆被子,洗衣服,闹得热火朝天^[29]。”延安北区的杨家湾原来卫生状况很差,经过努力“现该村已被选为卫生模范村,并对北区的各村子起了推动作用。该村曾发动村与村的卫生比赛。在它的影响下,原先不好的村子,如桥儿沟,蓝家坪等村子也都搞起来。杨家湾现已赶上原先卫生很好的杜家沟、任家窑子。现闻杜家沟、任家窑子都在随时改进卫生工作,他们说:‘咱们也不泄气,咱们要跟杨家湾比一比^[30]!’”

陕甘宁边区卫生运动中,群众对新知识的接受和积极参与是卫生运动的成功关键,卫生运动的策略均围绕这个目的而展开。从以上卫生报道看,边区卫生运动的群众运动式工作特点鲜明,第一,以医疗救助和防疫工作为先导,以预防为工作出发点,适时引导群众接受各种卫生宣传教育。第二,卫生知识的传播场景覆盖诊疗过程、日常生活、防疫过程等,不断强化宣传效果和力度。第三,通过社会舆论和群众性运动结合,形成了卫生方面个体行为规范和社会评价标准,取代改造传统认知和行为方式。第四,政府主导为卫生运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和资源,行政组织和群众性组织共同配合,运动方式灵活且效果显著。

2 现实利益、政治情感与民主实践

随着卫生运动广泛深入的进展,个体身体健康和环境改善效应逐渐显现,健康水平的提高给农民直接带来的好处就是保存家庭劳动力、生产促进的经济作用,减少因疫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这种对农民健康、家庭、经济等日常生活状况的改善,使农民个体心态从对卫生运动的不理解到积极参与,产生出与卫生运动相关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应,使边区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深入人心,卫生运动背后所代表的共产党政治权威得以巩固加强。

2.1 实现群众现实生活利益

边区卫生防疫运动减少了传染病对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的威胁,防止了疾病造成的劳动力减损。1944年2月在明确各机关卫生对群众的卫生责任后,直接影响到当年死亡率数据的下降,“中央医院的伤寒病死率,去年只有3.9%(前年为10.7%),肺炎的病死率也只有8%,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病死率只有5%,小儿的腹泻肠炎病死率是8%,近五百产妇则全无死亡,都较各国医学界报告的数字为低^[31]。”到下一年,“边区卫生署医政科统计:1943年该处所属院所,门诊和住院的病人总数为35370名,比1942年减少病人一万多名^[32]。”卫生状况的改善,解决群众“财旺人不

旺”问题,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背景下,农民在土地关系和农村借贷中负担相对减轻,家庭生产能力关键在于劳动力的投入量。卫生运动以预防方式,避免了流行性疾病的发生,降低或避免了群众的治疗花费,带来个体身体健康,小农式家庭生产增长和能够吃饱饭的事实使群众充分认识到,“病人睡下一炕,哪有心情去生产呢?”“生病吃药是最浪费的,预防是最节省的^[33]。”同时,群体性科学卫生观念和治疗习惯的形成,在社会层面破除了巫医迷信思想在基层社会的统治,一定程度促进了观念现代性。

群众现实生活利益不仅涉及生产生活,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整洁生活环境。群众性卫生运动所塑造的公认社会生活标准,形成了以往没有的强大社会行动力,整治了之前糟糕的生活环境,在社会生活的公共事务领域形成了标志性的外在效果。比如靖边张家畔开展卫生整洁运动,群众赞叹:“哈呀!真是政府领导的好,把这样烂脏的街道,也搞得这样整洁^[34]!”“甘谷驿已焕然一新,街巷都已打扫干净,街道上都洒了水。老百姓都很喜欢的说:‘这样清整洁齐,真是好^[35]。’”清洁运动中带来的环境卫生改善,为群众解决基本温饱后得以享受幸福生活创造了条件。这种卫生运动在公共环境整治上所带来的成效,产生了间接政治传播效果,进一步促进了群众对边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信服和治理效果的认同。

2.2 加强共产党和群众亲密情感

卫生运动改变了群众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和就医习惯,通过与传播科学卫生知识的卫生人员的密切接触,打破了传统封闭的小农社会秩序中对外来“陌生人”习惯性的戒备和排斥。卫生下乡工作中,起初“西河口工作组到达各村时,群众都不愿让在自己家里住,冷言冷语或者不给吃饱饭^[36]”,当卫生人员采取群众路线,放下架子,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转变了群众对卫生人员的排斥,形成对卫生人员及其所代表的知识体系的信仰和强烈感情。

《解放日报》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绘:卫生人员下乡“给娃娃看病的时候,常常看到孩子的妈妈向医生哭诉着,不断的忙碌着,谈论着,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医生的身上,临走的时候,又捧出鸡蛋、挂面来给我们,经再三解释而不收受^[37]。”边区卫生工作模范阮雪华医生主动下乡看病时,被救治群众争着与她结干姊妹、认干女儿,一次出诊“村口上聚集了二三十个人在迎接她。有的说当心狗咬了她,有的嚷着说叫打扫院子,有的说要赶快去做饭。”“过阴历年时,有十几家群众来请她们吃饭。有的妇女要代她们做鞋子、缝衣服。这些馈赠,她们总是婉言谢绝的。群众向东关区政府抱怨说,阮医生白医生给咱看病,那是真好,就是有一样不好,送的东西他们不要,怎么办^[38]?”

最为典型的是在1944年召开的延安各界卫生动员大会,“奖毕,复进行群众给奖,一时会场上空前热闹起来,无数抱着鸡,提着面,拿着鸡蛋和饼干的男女群众,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纷纷涌向主席团来,他们说:‘医生们平常给我们看病不要钱,不吃饭,今天可有机会表示咱们的心意了。’他们把自己的礼品写着送给

的医生的名字,高叫着送到主席台去,一种对医生的衷心感谢洋溢着整个会场。致使主席团应接不暇,达一小时之久,始收送完毕,而主席台上已被各色奖品堆积得无插足之地^[39]。”

2.3 推动基层政治民主实践

基层群众性卫生组织是卫生运动实践的重要载体。这些组织不是以强制命令改变农民个体观念和行为习惯,而是以群众参与的民主形式,激发群众自主、自觉性加入基层卫生防疫工作中,形成群众自我健康意识和个体的公共卫生责任,因地制宜主动建立基层卫生防疫防线。卫生运动的民主性具体体现在组织建设、规则制定、实践运行的环节之中。

组织构成的民主性。在成立各级卫生委员会时,强调县、乡基层政府主导卫生运动的同时,注意广泛吸收社会各方人士,如行政、卫生、教师、商会、检查站、村主任等^[40];承担卫生防疫工作的村级群众性团体的成员覆盖村内代表性群体,各村普遍的做法是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吸收入内,非常注重男性和女性在基层组织参与的平等性和妇女的话语权^[41]。这使得在传统农村社会毫无话语权的妇女,进入到了农村卫生工作的中心。因主要承担家务劳动以及人口生产功能,妇女承担起了推动卫生运动的主动责任,主导家庭生活计划和子女卫生教育。卫生运动为妇女赋权,打破了农村父权社会的权利结构,展现出基层民主政治转型的新趋向。

规则形成的民主性。订立基层卫生工作目标时,各卫生组织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充分讨论,制定村级的卫生公约,建立全村共同遵守的卫生标准。卫生公约多是“捕蝇、灭虱、洗脸、洗脚、修厕所,埋垃圾,不吃生水,掩埋死牲等”日常生活内容^[42]，“一顿不做一天吃的饭,五天清一次水缸,不喝生水。”等日常生活习惯^[43]。由于有了大多数人的平等参与和充分讨论,针对日常生活以科学标准指导下所订立标准不至脱离实际,流于形式和口号。卫生工作内容经由大多数村民参与议定,众人平等商量、共同遵守执行,成为民主因素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典型实践。

运行过程的民主性。基层群众组织在卫生运动中充分发挥协商、鼓励典型等方式,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借助政府的组织力量,以协商和合作民主方式推动卫生运动。比如淳耀县白塬村的卫生积极分子——小学教员黄逸民在解决当地人畜分居问题时,当地群众虽然也认可该做法,但苦于没有多余窑洞。黄逸民利用行政力量,通过乡长召集,召开村主任、村长的干部会,寻求支持,讨论如何在群众中调剂多余的窑洞;接下来召开村里积极分子会议,号召积极分子发挥模范作用;在村民会上号召群众自愿让出多余窑洞,若干村里的积极分子响应并无偿提供空闲的窑洞,解决了没有空闲窑洞的问题;同时还通过变工互助,发动群众互相帮助,共同搬移牛槽。最终解决了村里的人畜分居卫生问题^[44]。在筹办基层公助民办的医药卫生合作社时,基层政府和群众组织也比较注意防止生硬的摊派,从群众自身卫生需求的角度,以说服教育的方式,发动群众自发积极参股,“集钱买药”,防止硬性摊派^[45]。

从以上卫生运动对基层秩序改变和群众个体观念更新的效

果看,延安时期卫生运动实质具备了一定政治传播属性,即以卫生运动这种社会治理实践方式,将新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导入并改造了传统社会,以卫生知识为理论基础形成了基层社会新的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

延安时期卫生运动作为政治传播无疑是成功的。政治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价值导向是否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社会成员是按照其利益的实现程度来选择和接受某种政治价值观的。换言之,现实利益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传播的价值观能否被传播对象所接受^[46]。卫生运动对根据地军民身体健康的关注,与根据地建设、农民个体家庭经济、社会生活呈现正相关关系,使卫生这种之前被认为是私人领域事务,上升为公共领域的重要问题而被广泛接受认可。在利益共识建立的前提下,就必然产生从卫生运动所延伸出的群众政治情感倾向、政权向基层扩散、群众的民主化训练等具有鲜明政治因素。

3 卫生与政治现代化

政治权力深入社会生活、产生应有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关键在于一种公共利益被塑造、识别,并在社会取得普遍的共识。延安时期的卫生运动中,一种事关个体健康、家庭生产、根据地巩固、抗战大局的新的公共利益“卫生”被公众识别并得以确认。基于这种卫生利益的大众价值观念,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渗透入社会,使更多的个体受到影响,原有乡村社会生活观念和社会生活发生改变,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秩序和评价标准。个体逐步被纳入到由政治权力所主导的新政治社会结构和政治话语体系之中,这也意味着社会群体对新的观念、公共秩序和背后政治权力的接受与承认。在卫生运动中,群众对由卫生观念主导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接受,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的进一步接受认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更加复杂、多层次、合理化政治组织的建立和灵活运行。延安时期卫生运动中各级卫生机构和群众性组织的出现,也印证了“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47]。”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中,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也曾推动各种卫生建设,但为何没有产生相类似的政治对社会生活介入的现代性效果呢?仅从政党属性看,共产党严密的各级政治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方式尤为关键。在政权合法性构建中,共产党政府天然具有优势,因其组织形式严密,成为其权威性保障^[48]。组织优势又成为共产党能够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前提,群众运动又成为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的秘诀。在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战争方式建立政权、形成政治权威的过程中,“战争是暴力,但人民战争也是教育和培养人民,形成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实践过程。……所有这些新的集体生活的日常形式和新的价值,就是在战争和土改过程中逐渐发展并渗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意识之中的^[49]。”

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卫生问题是近代国家与国民相互关系理论和近代国家政治伦理理论的重

要来源。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与其他科技的权威性成为体制的基石,全国性行政体系与相关可接的结合,保障公民健康是政府责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困境中,卫生关乎民族复兴和现代文明方向,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焦虑和期待^[50]。”杨念群曾对建国初期卫生运动与新中国政治权威构建进行深入分析,抗美援朝期间的“细菌战”社会动员,将病菌来源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强加加害,激发出强烈的反帝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为建立新中国卫生体系进行铺垫,而且社会动员式的政治参与提供行为合法性,“通过广泛的防疫运动,使一般民众习惯于从卫生医疗的活动中感受政治影响”,强化基层群众对新中国的认同^[51]。如果本文分析结论大致无差,那么卫生运动与国家建构、政权合法性的联系,实际早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就已通过卫生运动进行了实践,成为全国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治理和群众动员方式,在更大范围赢得人民支持,更加有效地获得政治合法性认同的先声。

[参考文献]

- [1]朱鸿召.延安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上)[J].档案春秋,2020,(6):8-12.
- [2]马江.陕甘宁边区卫生防疫工作回眸[J].中国档案,2020,(2):34-35.
- [3]辛智科.延安时期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J].现代中医药,2020,(1):1-10.
- [4]薛永毅.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及其治理意蕴[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9):294-300.
- [5]尹俊芳.延安时期的卫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微[J].医学与哲学,2013,(11):91-93.
- [6]陈松友,杜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J].中共党史研究,2011,(6):80-99.
- [7]温金童,李飞龙.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J].抗日战争研究,2005,(3):153-173.
- [8]谢亮.“群众路线”实践与革命时期的政治整合——以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运动”为中心[J].广西社会科学,2020,(5):132-138.
- [9]郑志峰.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卫生制度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10]刘雪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颁布的防疫法规[J].党史文汇,2020,(4):32-38.
- [11]陈松友,杜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J].中共党史研究,2011,(6):80-99.
- [12]王元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J].抗日战争研究,2009,(1):59-76.
- [13]边区防疫委员会集会,总结医疗队下乡工作,延县急性病大致停止,慢性病仍严重存在[N].解放日报,1944:6-3.
- [14]各卫生机关均派出医疗队,延县传染病逐渐停止,区书区长会议决定各乡成立卫生委员会[N].解放日报,1944:5-24.
- [15]“团结”卫生部进行群众防疫[N].解放日报,1944:4-6.

- [16]安塞某医务所设群众病员招待所[N].解放日报,1944:4-6.
- [17]关中干部为群众服务带药下乡治疾病接生民力多生产[N].解放日报,1946:5-15.
- [18]保小罗冬祥医生不分昼夜为群众看病[N].解放日报,1944:10-25.
- [19]注意防疫,延县川口三乡病死三十三人[N].解放日报,1944:4-29.
- [20]边区防疫委员会集会,总结医疗队下乡工作,延县急性病大致停止,慢性病仍严重存在[N].解放日报,1944:5:18.
- [21]抗大卫生队协助下,子长开展种痘运动,深入群众宣传提倡新法种痘[N].解放日报,1944:4-7.
- [22]健康知识问答(179)血迷是怎样一回事[N].解放日报,1944:9-16-95.
- [23]赶快预防出水病、卖扫帚病、上吐下泻病[N].解放日报,1944年5月18日第二版.
- [24]李庸,为啥不敢喝凉水、吃生冷[N].解放日报,1944:6-1.
- [25]李恭秀,怎样预防上吐下泻病——几点马上要作的事[N].解放日报,1944:6-1.
- [26]马荔,关于口吐黄水病的初步探讨[N].解放日报,1944-6-24.
- [27]健康知识问答(179)血迷是怎样一回事? [N].解放日报,1944-9-16
- [28]马江.陕甘宁边区卫生防疫工作回眸[J].中国档案,2020,(2):34-35.
- [29]温金童,李飞龙.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J].抗日战争研究,2005,(3):167.
- [30]快快防疫! 延安市发现急性流行病延县新正等地病死达五十人[N].解放日报,1944-2-16.
- [31]延安市流行性感冒多数患者均治愈[N].解放日报,1944:3:2.
- [32]中卫边卫拟定预防传染病办法[N].解放日报,1944:3:7.
- [33]保证春耕进行,延安市召开防疫会议[N].解放日报,1944:3:12.
- [34]李庸,春耕期间传染病的预防[N].解放日报,1944:3:16.
- [35]李恭秀,预防感冒的一个好例子[N].解放日报,1944:4:16.
- [36]延县各区疫病流行,边区政府紧急动员防疫[N].解放日报,1944:5:12.
- [37]紧急防止疾病流行子洲、庆阳等地已死亡廿人以上[N].解放日报,1946:3:21.
- [38]绥德模范卫生家庭王思甫家受奖,一年四季保持清洁,自己造肥皂足供全家使用[N].解放日报,1944:7:23.
- [39]洪流,毛主席叫咱们人财两旺——记延安各界卫生动员大会[N].解放日报,1944:7:2.
- [40]甘泉一区卫生工作仅具形式[N].解放日报,1944:8:30.
- [41]安塞陈峁村大扫除,大家向不卫生的冯丕成斗争[N].解放日报,1944:7:23.
- [42]延安市王家坪村经劝说后开始注意清洁卫生[N].解放日报,1944:6:18.
- [43]从肮脏变成清洁,杨家湾当选卫生模范村,破除迷信相信医药全村气象一新[N].解放日报,1944:6:30.
- [44]傅连璋,一九四三年中央总卫生处工作总结[N].解放日报,1944:3:1.
- [45]边卫所属各院去年病员减少万名[N].解放日报,1944:2:1.
- [46]甘泉四区疫病流行[N].解放日报,1946年3月29日第二版.
- [47]靖边张家畔打扫街道[N].解放日报,1944:8:11.
- [48]甘谷驿全市大扫除,公共厕所各家猪圈均已修好[N].解放日报,1944:4:10.
- [49]边区卫生署,医疗队下乡工作的经验[N].解放日报,1946:2:14.
- [50]饶瑞,去年金盆区防止流行病的一些经验[N].解放日报,1944:3:16.
- [51]阮雪华.白浪二女医生热心为群众看病,她们处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也把她看成自家人[N].解放日报,1944:4:6.

作者简介:

刘欣,男,博士,西安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